

冷战时期的 美苏关系

LENGZHAN SHIQI DE
MEISU GUANXI

本书着重讲述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直接对抗、妥协的情况。
涉及的内容有：冷战的机理与概观、两极格局的形成、
美国的遏制战略、苏联的对外政策、美苏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美苏军备控制与裁军、中美苏三角关系。



牛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冷战时期的

美苏关系

LENGZHAN SHIQI DE
MEISU GUANXI



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之一



牛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牛军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
(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

ISBN 7-301-09584-8

I. 冷… II. 牛… III. 美苏关系—研究—现代 IV. D8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8303 号

书 名: 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著作责任者: 牛 军 主编

责任编辑: 刘 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584-8/K·041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5.75 印张 26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 言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初,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进行了一场持续 40 余年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抗与竞争。这场对抗与竞争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几乎所有的领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40 余年的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冷战”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是对 20 世纪国际关系中这一独特状态的形象化的概括。

冷战作为 20 世纪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在其发展演变直到突然结束的整个过程中,包含着一些对今天仍然有深刻启发的至关重大的基本问题。它们包括: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与冷战的缘起,以及世界政治中两极格局的形成;冷战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如两极格局中的地缘政治对抗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及其对美苏各自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影响;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而导致的美苏对抗中的自我控制机制,如所谓美苏之间反复出现的危机与“危机管理”的过程;也是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而造成的美苏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核军备控制同时存在;由于冷战的双方是美国与苏联两个世界级的超大型国家,由此导致的它们对抗从欧洲向全世界蔓延的过程及其后果;冷战同时也是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同盟之间的对抗,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内部的关系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过程;冷战的终结与苏联瓦解及其阵营崩溃的基本原因;等等。

毫无疑问,对上述那些冷战所包含的基本问题的反复探讨和解答,将帮助人们越来越深入地理解,冷战对 20 世纪历史乃至今后历史,已经和将会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正因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几乎是与冷战爆发的同时,国际学术界便开始了对冷战的研究。从那时起直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国际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可谓长盛不衰,冷战后甚至还出现了“新冷

战史”研究。

大致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冷战史研究逐渐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并出版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论著。这些论著涉及到冷战的历史以及在对冷战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些颇具理论色彩的思考与探讨,其中的主要共同点是它们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学者独特的视角,这种视角当然是同中国在冷战中的独特角色有直接的关系。这部专题讲义正是在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它部分地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界对冷战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

这本讲义包括的主要是美国与苏联之间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因为冷战的历史从起源到结束,都主要是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历史。贯穿所有前述重大问题之始终的,便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有关政策和它们之间关系的互动。不过,这本讲义力图与其他的论著有所区别,并适应专题教学的需要,其编写的主旨不是一般地叙述冷战中美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演变历史,也不是一般地分析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更不是面面俱到的。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力图勾画出冷战史的宏观图景。从 19 世纪国际关系历史发展中,梳理出冷战发生的脉络和线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演变,阐释导致冷战爆发的种种原因,包括美国与苏联的对外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在冷战爆发中所起的作用;从对 20 世纪后半叶国际关系历史进程的宏观透视与概括中,界定冷战的世界历史地位。

其次是在宏观图景下,突出强调从冷战兴起到最终结束的过程中,美国与苏联各自的安全战略、对外政策等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其发展与演变。在阐述美苏各自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过程中,分别分析了导致美苏各自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国内政治、双方关系相当复杂的互动过程、美苏处理各自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考虑,等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讲义中的一些部分,如美国的遏制战略、军备控制与裁军等,其内容多少涉及后冷战时期。由于这些部分从历史的进程本身看,的确后冷战时期有比较强的延续性。因此,讲义保留了有关部分中涉及后冷战时代的内容。另外,由于不是采取历史叙述的体例,各章按照专题的体例进行论述,个别内容出现交叉或重复,的确在所难免。

这部专题讲义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各章的内容主要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观点和见解,行文风格当然也难免各有其特色。作者分工如下:第一章由中

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撰写;第二章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徐蓝撰写;第三章由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冯海沧撰写;第四章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关贵海撰写;第五章和第六章均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戴超武撰写;第七章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撰写;第八章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撰写。附录的大事年表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荣文编辑。本书主编负责讲义编写的协调和统稿工作。在此向各位合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 者

2005 年 1 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1

第一章 美苏冷战史:机理与概观 时殷弘/1

- 第一节 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1
- 第二节 十月革命到冷战形成期间的美苏关系/5
- 第三节 美苏冷战的历程、基本性质和世界历史意义/11

第二章 冷战的起源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徐 蓝/20

- 第一节 冷战的起源/22
- 第二节 冷战的爆发/27
- 第三节 冷战高潮与两极格局的形成/33

第三章 冷战时期的美国遏制战略 冯海沧/40

- 第一节 遏制战略的提出与形成/40
- 第二节 遏制战略的主要内容/47
- 第三节 遏制战略的实施、调整与发展/50
- 第四节 遏制战略的终结与延续/80

第四章 冷战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 关贵海/82

- 第一节 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思想/82
- 第二节 苏联与冷战的形成/87
- 第三节 苏联对西方政策的演变/90
- 第四节 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96
- 第五节 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101
- 第六节 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与冷战终结/105

第五章 冷战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戴超武/108
第一节 “第四点计划”与杜鲁门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108
第二节 “冷战的主要战场”: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115
第三节 从肯尼迪到卡特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129
第四节 “里根主义”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141
第六章 冷战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戴超武/146
第一节 “两大阵营”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147
第二节 “和平共处”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152
第三节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攻势	/161
第四节 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	/168
第七章 冷战中的美苏军备控制与裁军	朱铎/173
第一节 军控与核军控	/173
第二节 冷战时期核军控的起步与进展	/180
第三节 “START I”和“START II”	/185
第四节 后冷战时代国际多边军控的发展	/188
第八章 冷战中的中美苏三角关系	牛军/198
第一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	/200
第二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发展	/213
第三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动与终结	/223
附录 大事年表(1945—1991)	/235

第一章

美苏冷战史：机理与概观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它们之间的冷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在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就国际体系的形成而言,冷战来自 19 世纪期间开始、并且愈益加速的国际权势分布的极化趋势。人口、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要素作为深层原因,两次世界大战作为极其有力和急剧的催化剂,造就了几个世纪里世界政治的头等重大事态之一,即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传统中心的欧洲的权势迅速衰落,“侧翼大国”美苏的权势勃然兴盛。

另一方面,美苏冷战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孕育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苏关系史:从列宁对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到斯大林(J. V. Stalin)对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日后美苏冷战的一个基本动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包括国际政治观)的摩擦、抵触和对立,都显得至关重要,尽管它们并非唯一的动因,而且并不总是排斥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妥协和进行协调,甚至不排除形成对世界命运头等重要的战时同盟。然而,意识形态对立同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超级大国利益竞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性地促成了美苏冷战。

上述过程构造了冷战史的基本问题,它们包括:冷战的起源、冷战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冷战的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美苏军备竞赛、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冷战的全球化、冷战紧张程度的起伏变化、冷战终结和苏联瓦解的基本原因、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等等。

第一节 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

国际体系是具体的国际关系在其中发生和运行的基本框架。大略地说,在永远相对能动和富于变化的个人因素之外,国际体系与其中各国内部

的社会、政治构造等一起作为主要因素,共同规定国际关系的状态和国家的对外行为方式。

国际体系的一个基本方面或要素,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或构造,而在这构造中,一般最重要也最引人注意的,是国际权势的基本分布状况,或曰各国间基本的力量对比状况,及其重大变化。它们在现代尤为突出地表现为强国的数目、规模及其相互间的实力和权势等级排列;表现在强国的兴起、衰落及其相互间的力量对比变更。

哈布斯堡帝国同法国宫廷之间近乎两极的冲突,法、英、奥、俄、普五强之间真正多极的均势,分别是16和18世纪欧洲国际体系构造的基本特征,而19世纪后半叶德、美、日三大新兴强国的急剧兴起,以及相应的列强间力量对比变更趋势,揭开了现当代世界格局演变的序幕。其后,国际权势分布的剧烈变动构成20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动态之一。

在19世纪(特别是其后期)以前的很长时期里,大致肇始于16世纪的现代国际体系总的来说,基本保持了一种相对分散的多元或多极格局,即16世纪时业已强大的法国、奥地利同十七八世纪先后跻身于强国行列的英国、沙俄、普鲁士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间力量对比大体平衡、并且长期保持动态稳定的五强格局。

诚然,其间有过路易十四(Louis XIV)和近一个世纪后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统治下的法国特别强大,而且据此大力追求霸权引起两番大失衡和大动荡,然而有如19世纪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首次提出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变动模式时所言,世界的激流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在潮退浪缓后它又得到重建。

欧洲取得的这种多强动态均衡局面在维持和充实了“经典的”国际法之外,塑造了“经典的”欧洲外交思想和实践,其中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经典均势论和均势政策。

在19世纪初期,经典均势的基本原则及其派生的均势营造章法,仍然是均势大师、奥地利宰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英国外交大臣卡瑟尔累(Robert S. Castlereagh)等人规划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安排的指南,尽管鉴于这场大战的教训,他们同时还搞出了“欧洲协调”这一重要创举主义。简言之,现代国际关系在至少一个多世纪里的面貌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多个强国间力量对比的大致均衡和相对稳定。

然而,19世纪期间,情况开始大变:从列强间大体势均力敌的状态中,浮现出国际权势构造的极化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我们时代超级大国的

雏形;另一方面,列强格局无论就强国的具体身份还是就它们各自的相对实力位置而言,都由于几个新兴强国的迅速崛起而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稳定不复存在。

极化趋势首先表现在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在列强中的突出优势地位。它尤其出自三大源泉:自 17 世纪末“光荣革命”开始崭露头角的海军、海外殖民地和远洋商业三方面优势;发动工业革命导致的技术和工商业遥遥领先地位;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带来的空前政治、经济、战略裨益。

从拿破仑战争末期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期间的俄罗斯,是当代超级大国的又一个雏形。就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权势而言,它远超过当时欧洲大陆其他任何国家;或者说,它是同海上超级强国不列颠并列的陆上超级强国。俄国的显赫权势直接来自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而其根本基础是它经几个世纪领土扩张和相对高速的人口增长而形成的巨型大国规模。这加上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往后虽然步履维艰,但毕竟有所进展的现代化,使之可以在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历史环境中,决定性地压倒欧陆“中等国家”,从而同英国一起,在事实上倾覆多强实力分布大致均衡的原有格局。

至于新兴强国的急剧崛起和列强相对实力位置的大幅度更动,则具有几乎惊人的突发性。大致从 19 世纪 60 年代中叶起,以美国内战结束、普奥战争和其后普法战争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为四大标志,国际权势构造剧烈变动的时代终于来临。在此后约 80 年岁月里,伴随着激烈的国际斗争,乃至规模空前和极其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包括英、俄、法、奥等传统强国或衰落或崩溃,美、德、日、苏在内的四大新兴强国先后崛起,此外更有德、日两大新帝国暴发而后暴亡(德国更是两番经历了这种过程),超级大国两极格局最终取代传统列强多极格局。

如果说国际权势格局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变化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它们作为首要因素,与其他种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原因相结合,造成了不同国家间非常不平衡的发展,导致了国家相对实力的跳跃式增长和跌落性下降。

20 世纪以前,欧洲(严格地说是中西欧)一直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心,甚至可称现代世界的中心。总的来说,欧洲拥有远为优越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势,不仅欧洲的意愿和事态之影响外部世界远甚于外部世界之影响欧洲,而且非欧地区的几乎所有社会和国家,都先后沦于欧洲的统治或支配之下。欧洲列强总合起来大体左右了世界政治基本格局。国际法体制既是在

欧洲起源并且大多在欧洲得到发展,也是从欧洲扩展到世界,而那些历史影响非常巨大的更广泛的现代国际关系价值和思想观念,从国家利益、主权和均势,一直到自由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但是,到20世纪后半期开始时,欧洲已经无可争辩地失去了它的传统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东西两个侧翼大国——美国和苏联。欧洲权势的衰落与美苏权势的兴盛是开启世界政治新时期的一個决定性事态。

在多年里,美苏拥有即使欧洲列国加起来,也远远不可相比的实力和权势,而且将欧洲本身分割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由此主宰欧洲的命运。在欧洲以外世界各地,主要的外部影响已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美苏。

世界政治—军事结构普遍公认由多极变成了两极,美苏两大超级强国及其同盟体系之间的对峙僵局,取代了传统多强均势。几乎同样重要的是,美苏两国作为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大输出者,以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大力从事并多少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尤其激烈的争夺人心的竞争,并且作为欠发达世界的民族主义之外最大的两股力量,推动了国际规范的多种变迁,而欧洲在这两方面至多只是配角。

这个事态可以说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最大必然性之一,它涉及人口、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在自然资源、生态和生产力水平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人口作为国力的基本成分之一,意义十分重大。

大约从1890年起,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而美俄两国人口迅速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已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大国,此后差距进一步拉大。虽然欧洲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技术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余地区的人口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俄苏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同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

最后,侧翼大国取代传统中心的显赫地位,还由于一种贯穿几个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制使然。从16世纪哈布斯堡帝国的称霸企图夭折,到20世纪纳粹德国的统治野心破灭,欧洲均势历经打击而犹存,首要原因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地引入外部新力量来拯救欧洲的国际平衡。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反复重演的过程中,侧翼大国会形成越来越大的权势,传统中心则逐步丧失其优势地位。犹如先前的反霸大战导致英国兴

盛和欧陆相对衰落那样,美国和俄苏从拿破仑战争往后,不止一次决定性地扭转了欧洲战局,它们的强盛和欧洲的衰落便势所难免。

两次世界大战是这一巨大变更得以实现的主要直接条件。首先出现的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衰落和美国权势兴盛,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个过程终告完成,即使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美国对欧孤立主义卷土重来,加上德国暴发和苏联羸弱等原因,欧洲似乎仍然显赫无上。

其次是苏联权势的形成和兴盛,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极端羸弱开始,继之以斯大林铁腕治理下苏联国力剧增,直至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仅有美国可与之匹敌的一等强国。“欧洲时代消逝”,美苏两极时期来临,而且是两极冷战对抗局面,全球国际体系随之有了与它在问世以来大为不同的构造和状态。

第二节 十月革命到冷战形成期间的美苏关系

美国和苏联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反的国家,它们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基本性质方面大相径庭,而且几乎始终彼此谴责对方。美苏两国都持有改造国际社会的长远目标,各自试图重新安排国际关系和国际体制,使之符合它们彼此对立的理想和利益需要。尽管美国追求这种目标的意愿的一贯性及其强烈程度,总的来说显著超过苏联。

另一方面,美苏两国都不时面临具体需要与长远目标相矛盾的各种形势。这些形势要求主要根据当前利益和现实环境、而非意识形态来决定有关的对外政策和策略,并且往往要求两国以灵活而非僵硬的态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妥协、进行协调甚或谋求合作。美国和苏联又都是拥有巨大实力或潜力以及广泛的国际利益和势力的大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从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总是受世界政治重大事态的直接影响,同时又直接影响、甚至往往决定世界政治动向。

就美苏的综合国力对比而言,美国始终处于强者地位,在两国对立的时期里,它的对苏态势和政策之损害苏联的程度,一般甚于苏联对美态势和政策之损害美国的程度。上述种种是纵贯70年美苏关系历史、包括后半段即美苏冷战史的最基本的事实。

1917年俄国发生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即将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政府对之表示热烈欢迎。威尔逊总统认为,由此而来的俄国“民主

化”大有助于实现他的世界政治理想,即确立美国领导下的、通过“民主国家伙伴关系”,确保持久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威尔逊为确立这一国际秩序而谋求的直接目标——彻底战胜德国和奥匈帝国——需要实际上已经筋疲力尽的俄国继续作战,而这必然大加加剧战争苦难所酝酿的俄国新革命危机,使得临时政府代表的所谓民主力量丧失生存希望。美国政府力促临时政府从事战争,特别是以继续作战为条件给予经济援助,并且派遣一系列使团前往俄国鼓励士气。这同英法等国政府的类似的努力一起,实际上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起了促进作用。

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美国最初的政策是以阻止俄国退出战争为宗旨。为此,威尔逊曾批准,向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武装提供秘密财政资助,以便推翻苏俄政权,保证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内。美国的更重要的举动,是在1918年1月宣布美国的战争目的,即自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其动机之一在于通过其中第六点,即德军撤出俄国,让俄国不受外来干涉地决定自己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以争取正在进行布列斯特和谈的苏联政府不同德国单独媾和。同时,他还试图依靠“十四点”,用事实上已经由列宁提出的、对交战国人民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公正与民主的和平”口号和民族自决原则,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

布列斯特和约缔结后,美国政府先后向俄国北部港口和西伯利亚地区派遣干涉军。虽然导致这些武装干涉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应付英法两国的敦促,阻止德军夺取堆积在俄国北部港口的协约国军事物资,提防和制约先行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的日本的扩张图谋等等。但它们同时也表现了威尔逊对苏俄政权愈益强烈、愈益僵硬的敌视态度。他坚决不承认苏俄政权,坚信必须铲除布尔什维主义。

与之相比,列宁的对美政策灵活得多。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一战略思想和基本策略出发,列宁通过各种渠道,多次主动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达成政治谅解和进行经济合作的建议,例如以相当宽容的条件结束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给予美国广泛的经济租赁权。然而,这些建议无一得到美国政府的认真考虑,更谈不上被美国政府接受。

20年代伊始,苏维埃政权已战胜国内敌人和外国武装干涉而得到初步巩固,与此同时,由于大战而革命浪潮四起的欧洲局势相对稳定下来。在此情况下,西方各大国和苏联之间长期共存共处势所必然。问题只在于这种共存和共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还是全面对立的。

列宁对比较正常的美苏关系寄予相当大的期望,认为在西方各大国中间,美国对苏联的直接威胁最小,而经济实力又最强大,与之交往特别有助于瓦解国际反苏阵线,加强苏联的外交地位和促进其经济建设。从这样的考虑出发,他继续努力向美国政府显示可以在苏联得到有利的经济机会。

但是,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了在西方各大国中间最为敌对也最为僵硬的态度。它拒不承认苏联,拒不与之进行经济交往。不承认政策首次由国务卿科尔比(Bainbridge Colby)1920年8月致意大利驻美大使公开信中,予以正式的系统表述,其中列出不承认的三大理由:(1)布尔什维克政府出自暴力,不代表俄国人民;(2)它拒不履行俄国的“国际义务”,包括临时政府的国际债务;(3)它公开对世界各国政府表示敌意,并且向全世界输出革命。

哈定(Warren G. Harding)政府的国务卿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则于1921年3月宣布,除非布尔什维克政权根本改变其国内社会经济体制,美国政府不会恢复与俄国的贸易。

由于许多美国私人企业对美苏经济交往持积极态度,加上当时盛行的“自由放任”经济原则使美国政府不便干预,因而两国在租赁、贸易和技术合作三方面的经济交往等,在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颇有进展。然而尽管如此,不承认苏联仍是从哈定开始三届共和党政府的不变国策,而苏联指挥下共产国际的广泛活动,据信是美国当时坚持这一国策的头号原因,并且被用作为之辩解的首要论据。

进入30年代后,随着日本侵略浪潮的兴起,美国和苏联政府都开始感到,缺乏外交关系使两国无法就遏阻日本扩张进行协调。1932年,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曾就此同苏联高级外交官秘密会晤,但是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强烈的反苏情绪和害怕激怒日本的心理占据上风。

1933年初罗斯福入主白宫后,情况有了变化。罗斯福总统认为,不承认政策既根本无法达到改变苏联国内体制和对外行为的目的,又严重阻碍美国取得苏联的合作来对付日本凶猛的扩张势头。按照他的提议,苏联政府派遣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Maxim Maximovich Litvinov)赴华盛顿谈判承认和建交问题。

多半是为了应付国内反对承认苏联的那部分舆论,罗斯福要求苏联接受取得美国承认的三项先决条件:尊重苏联境内美国公民的宗教自由,许诺偿还十月革命以前临时政府欠美国的债务,停止共产国际通过同美国共产党的关系来干预美国内政。李维诺夫明确接受第一个条件,并且用变通和含糊其辞的方式接受了后两个条件,双方遂于1933年11月17日签署建交

协定,美国长期拒不承认苏联的局面终告结束。

然而,美苏关系并未因此而有着实质性的改善,其原因包括:孤立主义势力束缚下美国对日本扩张长期采取软弱态度,苏联亦在很大程度上因此(加上英国的对日软弱)而实行姑息日本侵略的远东政策;美苏两国就债务和共产国际同美共关系这两个问题争执不已;苏联国内大清洗,连同苏联政府极其严厉地限制本国公民同外国人之间的交往,加剧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厌苏反苏情绪。到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且按照其秘密议定书采取一系列领土扩张行动后,大多数美国人更是将苏联视同于纳粹德国。

但是,罗斯福坚定地认为,美国的主要敌手是德国,而苏联是可以争取的潜在盟友。他不顾政府内外的各种反对,不采取恶化美苏关系的措施,并且试图通过1940年7月起在美国国务院与苏联驻美大使之间进行的美苏秘密谈判,促使苏联疏远甚或反对德国。

1941年6月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罗斯福迅速着手向苏联提供援助。是年底,美国因珍珠港事件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美苏战时同盟迅即正式形成。自此开始,罗斯福的对苏政策宗旨是维持美苏同盟,最大程度地利用苏联打击德国,同时争取消除苏联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感和潜在敌意,为战争胜利后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体制奠定基础。为此,他将租借法延用于苏联,并且坚持实行以最优惠待遇(同美国对所有其余盟国的待遇相比),向苏联提供租借物资的政策。这一军事援助总额达1700万吨物资,价值100多亿美元,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某些环节上是关键性的贡献。

然而,由于首先由德国潜艇战造成的运输方面的巨大困难等原因,在1943年年终以前,即苏联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时期里,美国实际交付的援助物资显著少于它在有关协定中做出的对苏承诺,这就促使苏联怀疑其合作诚意与动机。

第二战场问题造成了同样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尽管在德苏战争爆发后3年时间里,尽早开辟欧洲大陆第二战场一直是苏联对西方盟国的头号要求,而且罗斯福曾亲自向苏联领导人许诺,在1942年内满足这一要求。但英国的消极、后勤困难以及对于美军大量伤亡的顾虑,使得第二战场的开辟一拖再拖,严重损害了建立罗斯福所希望的美苏相互信赖关系的可能性。

更深刻的矛盾存在于罗斯福的战后世界构想与斯大林定义的苏联战后安全需要之间。罗斯福谋求建立政治上贯彻自决原则、经济上实行门户开放的自由国际主义战后秩序,并且希望以基于大国协调,特别是美苏协调的

真正有效的世界性国际组织,维护和保障这种秩序。这一战后蓝图的本质,是旨在由美国安排和支配世界政治经济的“全球主义”。

就对苏外交来说,自决原则这一条特别重要,它既构成罗斯福的国际政治信仰的一个核心成分,也被他视为防止美国重蹈一战后孤立主义覆辙的必要条件。因为国会和公众被很有理由地认为不会接受一个过于明显地建立在欧亚强国势力范围基础上的战后格局。但是,苏联的战争目的除了彻底粉碎纳粹德国侵略、捍卫自身的生存和独立外,首先是要通过领土变更和控制东欧来谋求战后安全。

就美苏战争目的的这种对立而言,最重要的是:(1)对于美国官员来说,战时经验中最具决定性也最经久的遗产,在于决不能再允许潜在敌手通过经济闭关自守、政治颠覆和(或)军事侵略,取得对欧亚大陆资源的控制”;(2)斯大林相信,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大国,总是企图削弱苏联,甚而消灭其政权,因而苏联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并且改善自身的地缘战略条件,才能遏阻侵略,迫使帝国主义大国较为经久地同苏联和平共处,也才能在对苏侵略发生后立于不败之地。

诚然,罗斯福自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起,向苏联在东欧的要求做出重大让步,尤其是基本同意了其中的领土要求,但他坚持东欧各国实行基于自由选举的代议民主制,至少形式上必须如此。

继任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大多数行政当局主要官员和国会议员在这方面的态度更是强硬和简单得多。美国反对其他国家建立势力范围的自决原则,同苏联在东欧的政治要求殊难相容。尽管双方都曾试图探求妥协的途径,并且确实达成了若干实质性的和表面的妥协,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欧问题已经使美苏关系蒙上了非常严重的阴影。

随后,关于德国问题的重大利益抵牾和政策分歧,使得美苏矛盾更加激烈。美国为了确立它支配下的稳定繁荣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和促进西欧重建,采取复兴德国西占区经济的政策,为此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损害了苏联的一项根本利益——通过获取德国的巨额赔偿来加速本国战后重建,并且使苏联严重担心在美国扶持下德国威胁再起。

东欧和德国问题上愈演愈烈的对立同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反共情绪和“世界领导”欲望互为因果,并且作为一个基本原因,促使斯大林改变战时旨在举国上下团结抗德的比较宽容的国内政策,重新实行高压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斯大林治国模式”。

上述三者共同促成了美国冷战思想的形成。这一思想由驻苏使馆代办